



引用格式:王浩斌,陶廷昌.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历史贡献[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5):7-13.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5.00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5-0007-07

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历史贡献

Cai Hesen'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sinification of Marxism

王浩斌, 陶廷昌

WANG Hao-bin, TAO Ting-chang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和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蔡和森,不仅率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而且从理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及其发展史进行了探索。从历史背景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个人自身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对社会主义的不懈追求,是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主客观条件。他明确了从学说史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科学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逻辑基点、根本问题和重要途径。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过程中,蔡和森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和辩证法原则,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特色,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

蔡和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收稿日期:2017-04-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KS017);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14YBA398)

作者简介:王浩斌(1976—),男,湖南省双峰县人,中南大学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有着两重内涵,它既是指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发展史和演变史,同时也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说萌芽、形成、深化和拓展的变迁史。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和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蔡和森,在早期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不仅率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而且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学术层面……作了可贵的理论探索……蔡和森留法期间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化的探索,结合于他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与实践,从学术层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1]。蔡和森的这一理论探索实质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说及其发展史的探索。全面系统地总结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说史的历史贡献,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一系列社会历史条件互相作用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蔡和森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还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说史的理论探索,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厘清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说史的历史背景,有利于深刻地认识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说史的历史贡献。

1. 国外背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自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世界

历史进入到了一个崭新发展时期,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时期或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爆发的无产阶级依靠武装暴力直接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是在帝国主义实力较强的法国诞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而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帝国主义较为薄弱的环节发生且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些事件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尤其是对中国的进步青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所引发的示范效应是息息相关的。1920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并从四个层面对其进行了具体的划分:一是从革命已经成功的层面,指出俄国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二是从革命正在进行的层面,指出中欧及巴尔干战败国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正在发动的国家;三是从革命孕育的层面,指出五大战胜国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尚在酝酿中的国家;四是从革命觉醒的层面,指出土耳其、波斯、埃及、印度、朝鲜、中国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属于无产阶级觉醒后由爱国运动引导到“布尔什维克”上去的国家。蔡和森在科学分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改造中国与世界”^{[2]57}的主张,也就是主张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因此,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胜利,构成了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说史的国外背景。

2. 国内背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说史,不仅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所引发的示范效应为根本前提,而且同中国近代以来积极寻求现代化发展的出路所引发的实际需要息息相关。当时国内文化危机所引发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烈需求,导致了蔡和森这一理论的探索。历史地看,当时国内文化危机所引发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烈需求已然成为影响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发展和演变的主要因素。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亡国灭种危险之中的中华民族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艰难历史抉择。历史表明,无论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发动的器物层面(如引进西方技术等)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制度层面的戊戌变法,都不能引导中国摆脱内忧外患的窘境,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至于农民阶级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尽管他们把矛头直指腐朽的封建制度,但由于自身和时代的局限性,都相继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但未能建立起新的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社会制度,此后的军阀混战使中国社会更加黑暗和混乱。要解决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出路问题,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文化反思和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根本前提就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找到生长点,即实现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进而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蔡和森联同毛泽东等人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发起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运动,成立了新民学会。这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无疑为蔡和森发起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深入梳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提供了良好契

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是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国内背景。

3. 主体条件: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对社会主义的崇高信仰与不懈追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主要是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反思。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事实上已经开启了,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尚处于不自觉的阶段,更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史的梳理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展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研究,无疑需要研究主体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较强的分析问题能力和丰富的知识积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知识的积累,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这些条件,蔡和森全都具备。蔡和森在赴法国勤工俭学之初就写信给毛泽东,将“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确立为勤工俭学的一项重要内容。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卤猛看报”,并在致毛泽东的信中提到,拟编译一套传播革命运动的丛书,内容包括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俄国十月革命后之详情四个方面。他在信中指出:“这四种东西,现已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迟到年底,或能成就。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2]49-50}通过读报学习法文,蔡和森随后翻译出《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以及宣传十月革命和各国工人运动的资料。蔡和森认为,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是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情的,也适用于中国将来的改造。可见,蔡和森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对社会主义的不懈追求,构成了他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主体条件。

二、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主要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蔡和森作为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不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理论探索,而且也开启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历史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从学说史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这种研究是否必要?对此,蔡和森认为,从学说史的角度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其一,这是有效增进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解与认识的必由之路。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存在着理解上的分歧甚至怀疑。例如,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存在着冲突,即“马克思一面主张人为的革命说;一面又主张唯物史观”^{[2]80}。显然,陈独秀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他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强调的历史观是客观性和人为性的有机统一,既有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又有着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发挥。正如蔡和森所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全在于其把人为性和客观性这两点结合起来。他还认为,这已经为俄国十月革命所证实。因此,只有从学说史的角度科学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及其运用,才能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差和怀疑,有效增进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认识。

其二,这是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

程的必由之路。蔡和森认为,我们固然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但更应该注重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各国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3]所以蔡和森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既包括其理论的发展进程即学说演变进程,同时也包括其实践进程。因此,从学说史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能够在其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中实现理论和实践的互相确证,从而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其三,这是有效增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并提升党的先进性的必由之路。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惟其如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研究无疑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可持续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蔡和森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这就是为了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经验与教训,深入梳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

2. 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逻辑基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发展史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指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点或理论。就此而言,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自然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先决条件与活水源头。在蔡和森看来,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性把握并实现其中国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逻辑基点。

1921年2月11日,蔡和森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中,一方面强调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称自己为“极端马克

思派”,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2]74};另一方面,又严肃批评了初期社会主义、乌托邦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吉尔特社会主义和修正派社会主义。他认为,初期社会主义和乌托邦共产主义属于没有内在理论依据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表现为不识时务地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工团主义仅仅专注于经济行动,吉尔特社会主义的特点是调和劳资矛盾以延长资本政治,修正派社会主义则是严重歪曲、篡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鉴于此,蔡和森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学说,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2]74}。蔡和森指出,若要达到这一目标,一定要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把握革命说与进化说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侧重于革命说就必然导致感情的革命主义;如果偏向于进化说就会演变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主义。他深刻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成功的根本之道就在于综合、全面地把握住这两种学说之间的辩证关系。

随后,蔡和森还以马克思的学理作为切入点,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作了深刻分析。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的完整而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蔡和森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学说,必须将马克思的革命说同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结合起来。他由此提出了唤醒中国无产阶级的必要性和推进中国无产阶级社会运动的“三步骤”:第一步是为争取生存权和劳动权而向政府论战,并强迫政府向五国银团借入大量的实业外债;第二步是对借入的大量实业外债进行严格管控、监督,落实其用途;第三步是争取产业管理权和政治管理权。蔡和森坚定地认为,这三个具体步骤是中国社会运动、社会改造的不二法门。由此可见,蔡和森在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过程中,始终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性理解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作为逻辑基点。

3. 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有贯穿始终的根本问题或基本问题。在蔡和森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根本问题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党的建设,并形成“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理论”的问题。事实上,蔡和森就是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撰写就是在这个思路指导下完成的。蔡和森指出,要形成适合中国共产党发展要求的“自己的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其一,必须坚定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此,毛泽东在回信中非常认同这一观点,并说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4]其二,必须坚定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自己的理论”。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党的理论创新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过程,或者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其三,必须坚定地反对各种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像叛徒兼骗子的施存统辈一样。”^{[2]803}在蔡和森看来,施存统的主要错误在于对革命社会主义前途的论断上,错误地认为革命社会主义前途属于现成的东西,不需要进行任何斗争就可以顺利达到。对此,蔡和森

严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反对党内党外现存的两种错误论调:一种是类似于施存统辈观点的油腔滑调,另一种是类似于陈公博“物观论”的机会主义。由此可见,蔡和森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研究,实质上是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服务的,而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探索又恰恰是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历史贡献。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蔡和森在厘清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三条重要实现途径。

其一,应向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学习,也就是按照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的发展。基于此,蔡和森主张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仅应包括马克思主义,还应该包括列宁学说,即“共产党的原理和方略,我须先研究清楚,现已译‘议院行动’(系万国共产党之魁作)一篇,及列宁等重要文字数篇,拟续译‘俄国共产党大纲’”^{[5]26}。

其二,必须科学地总结中国共产党早期建设的历史经验。正如前文所述,蔡和森实际上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史的角度来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发展史的。在蔡和森看来,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实质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因此,蔡和森全面总结了自中共一大至中共四大以来这段历史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写成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研究报告。这无疑是在我党历史上开辟了中共党史的研究范式,也事实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研究范式。

其三,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进行研究,需要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运动。1920年

5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强调文化运动的重要性,提出了推进文化运动的具体方法,即“仿照李石曾贴邮花的办法”^{[5]20},同时强调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运动,即“现在中学以上的文化运动,要算各处都已进发了,新民学会所宜注意的,自小学文化运动以外,应注意劳动的文化运动”^{[5]20}。中国共产党后来的发展表明,通过兴办新民学会和开展文化运动,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即文化运动的道路,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影响深远。

三、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方法论特色

从理论生成的视角来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萌芽、形成、深化和拓展的发展史。蔡和森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发展史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宏观历史进程为背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进行梳理和研究的过程中,蔡和森很好地贯彻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并形成自己的方法论特色。这是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另一重大历史贡献。

首先,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始终是蔡和森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是他整个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出发点和哲学基础。这是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时所运用的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基本支撑。其次,1924年蔡和森撰写的《社会进化史》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创新性成果,它奠定了蔡和森分析

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发展史的方法论基础,是蔡和森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新生态。最后,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科学地运用历史主义方法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及其历史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理论内涵。正因为蔡和森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过程中很好地贯彻了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所以,蔡和森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研究范式。

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过程中,蔡和森所运用的历史主义方法论还很好地贯彻了辩证法的原则。1919年,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论述自由问题的时候强调:“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2]²³蔡和森指出,为达此目的,必须积极发展和传播列宁的理论主张与观点,学习他的先进思想,更为直接地了解和研究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运动;在追求自由、实现自由目的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如“不必要”中渗透“必要”,“厌恶学校”的同时又要“欲入学校”。在这里,蔡和森不仅在对自由思想尤其是对列宁的自由观的理解上贯彻了辩证法的方法论原

则,而且在对自由实现的手段选择上也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方法论原则。正是基于对这些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蔡和森的探索取得了重大进展。其研究成果,无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发展,还是对于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尽管蔡和森一生极为短暂,但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探索确立了一种典范,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极大地深化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与研究。

参考文献:

- [1] 李永春. 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8(5):53.
- [2] 蔡和森. 蔡和森文集[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 [3] 蔡和森.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21.
- [4]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4.
- [5] 蔡和森. 蔡和森文集:上[C].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